

欧洲犹太移民潮与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

宋全成

(山东大学 欧洲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在严格意义上说, 以色列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移民国家。一是指以色列国家首先是由欧洲国家的犹太移民建立的; 二是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是建国后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从欧洲历史上看, 欧洲国家的犹太人, 经历了五次的“阿里亚”(AL IYA)即“移居以色列地”的移民潮, 最终确立了以色列国家的合法地位。以色列建国后, 从世界各地进一步移民, 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 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移民社会问题。

关键词: 欧洲犹太移民; 以色列国家; 移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 B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 4721(2003)02- 0067- 07

人们论及移民国家, 自然就想起了美国、澳大利亚或加拿大, 但是,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而言, 以色列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移民国家。这里包括两重含义: 一是指, 以色列国家是由移民建立的。首先是由欧洲国家的犹太移民, 从 1882 起, 基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崇高理想和充满智慧、英勇战斗的果断行动, 通过“阿里亚”(AL IYA)即“移居以色列地”运动来实现的。在 1882 年以前, 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只有 2.4 万人, 但是到 1948 年以色列国家建立时, 在这 66 年的时间里, 通过 5 次大的欧洲移民潮, 犹太人口猛增至 65 万人, 其中 50 万人来自俄国和东欧国家, 其他来自德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家, 只有少量犹太人来自阿拉伯国家。^{[1](P115)} 二是指今天以色列国的主体民族——400 万犹太人, 约有 200 万人是在以色列建国后, 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移民而来的。今天 400 多万犹太人中, 绝大多数是移民及其后裔。本文拟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 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犹太移民的历史背景、进程及以色列国内的移民社会问题, 作一简要探索。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和同行指正。

一、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犹太移民潮及其历史背景和进程

如果我们从移民历史的角度, 看待来自欧洲的犹太民族移民潮的话, 我们会清晰地发现: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犹太移民返回圣地锡安山的运动, 直接推动了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潮前后经历了五次。那么, 是什么样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原因, 驱使欧洲的犹太移民, 不远万里, 历尽千辛万苦, 回归以色列呢?

1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移民潮的思想源流

第一、回归圣地锡安山思想的产生。19 世纪下半叶, 东欧的犹太人的政治处境日渐艰难, 西欧的反犹主义也初现端倪。这就迫使一些有创新远见的犹太思想家, 为犹太人的问题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之路。他们的答案就是: 回到圣地锡安山(Zion)去(锡安山, 圣城耶路撒冷老城边上的一座小山, 古代犹太国的国王大卫安葬在这里。犹太民族视之为故乡的象征, 锡安山主义, 即犹太复国主义)。只有让犹太人在其故乡部分或彻底

收稿日期: 2002- 10- 18

作者简介: 宋全成(1964-), 男, 山东青岛人,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欧洲政治学、欧洲政治哲学。

地获得土地和独立, 才能在根本上解决犹太人的出路问题。

在 19 世纪 60 年代, 有两种主要代表思想: 第一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关系甚密的摩西·赫斯为代表, 在其名著《罗马和耶路撒冷》一书中, 他认为, 人类的解放和未来, 必须急切地发展各个民族的民族觉悟。这里当然包括犹太民族。犹太民族的未来, 只有靠它的人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团聚才能得到保证; 第二是以犹太教拉比犹大·阿卡莱和策维·赫什·卡里希尔为代表, 他们认为, 犹太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要为救世主弥赛亚的复归准备好场地。为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在以色列的故有土地上大规模地移民、开发和定居。这既是东欧的犹太人艰难处境考虑的即时解决办法, 也是犹太人长远的和根本的出路。但这两种思想都主张犹太人民在其故土的回归。这种回归的思想对后来的犹太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以及全世界的犹太人民, 特别是处在东欧、西欧的犹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预言家、后来成为锡安山工人党的领袖人物的纳赫曼·西尔金(Nachman Syrkin), 在 1898 年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犹太国》, 1905 年约瑟夫·维特金(Josef V itkin)发表了《对献身于民族复国主义的犹太青年的呼吁》, 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同样主张犹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回归。认为除了在犹太民族的故土建立一个犹太国以外, 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1](P83)}而许多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如本·古里安等则直接积极投身于建立以色列国的宏伟事业。回归故地, 已经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 驱使和鼓舞着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民, 不畏艰险, 前赴后继, 面对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踏上了建立以色列国的光辉之路。

2.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移民潮的社会背景

从中世纪到近代, 犹太人在欧洲各国, 不仅遭受到残酷的宗教压迫, 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上层的迫害。特别是当社会矛盾激化, 危及到政府统治的时候, 统治者总是转移人民的视线, 将社会冲突的矛头, 指向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 对犹太人在政治上加以限制、歧视和迫害; 在经济上剥夺犹太人用智慧、劳动和汗水积累起来的资本。在东欧各国和沙皇俄国, 由于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和统治者的落后与残暴, 整个社会生活毫无民主可言, 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也就更为猖獗。

18 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给犹太人获得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地位, 带来了一线生机。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大陆的胜利, 使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观念, 深入人心。伴随着犹太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 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思想开始在欧洲犹太人的心中萌生。寻找祖国, 已经成为许多犹太人的梦想。普鲁士犹太人起草宣言, 表达他们希望有个“祖国”的热烈情感。“呵, 有一个祖国, 那是多么神圣的感情啊! 呵, 在这可爱的世界上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和避难所!”法国犹太人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推动下, 组成特别代表团出席大陆会议, 要求讨论犹太人问题。1791 年 9 月,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 首次承认犹太人为法国公民, 随后, 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普鲁士生活的犹太人相继获得了所在国家的公民资格。但是, 在其后的 100 多年的欧洲发展历史表明, 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融入所在国家和社会中, 而各国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俄国和东欧国家, 由于缺乏民主体制, 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尤甚。^{[2](P27-28)}到 20 世纪上半叶, 以法西斯德国为代表, 对犹太人的迫害与残杀,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犹太人看来, 犹太人要想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德国犹太思想家摩西·赫斯在 1862 年就明确指出, 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 不是一个宗教集团, 犹太人的解放, 决不能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的同化来完成。“在各个民族之间, 我们犹太人将永远是外来人……每一个犹太人, 不管是否愿意, 在血统上就同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紧密相连……每一个人对于以色列的复兴都生死与共, 负有责任。……为了使犹太国复活, 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在政治上复活我们的国家;”“向我们祖先的国家移民。”^{[2](P28)}1882 年, 热爱圣山运动的领袖列奥·平斯克在《自我拯救》的著作中, 也同样认为, 犹太人在寄居国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想作为一个民族而永久存在, 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聚集中心。^{[1](P28)}

从整个欧洲的移民社会背景来看, 当欧洲犹太移民潮开始酝酿的时候, 移民潮已经在欧洲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对新世界的渴望和美好社会的向往, 促使一部分非欧洲社会上层的人士, 离开自己的祖国, 远走他乡, 开始了移居海外的移民潮; 另外, 由于在欧洲的新教徒不断受到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迫害, 迫使新教徒离开欧洲大陆, 加入到移居国外的行列中来。到 19 世纪, 移居海外, 已经成为当时欧洲的一种社会潮流。欧洲大陆各国政府, 并没有对这种移民潮加以阻止, 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予以纵容。因为, 在各国政府看来, “外迁移民尽管被作为经济上的损失和文化上的‘放血’而被指责(Beklagen), 但它同时作为在资产阶级时代对付令人担心的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安全阀门——外迁移民

同时也是社会革命问题的出口。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看来,大量的移民外出,也是社会革命和社会问题的输出。仅以德国为例,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有550万跨越大西洋的德国移民到达了美国,至今美国已接受了总计880万的德国移民。^{[3](P324)}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的犹太移民迁出欧洲大陆,自然也是这股欧洲移民潮的组成部分。

3. 以色列建国前的欧洲移民潮的历史进程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来自欧洲的重返家园的犹太移民,总共形成了五次大的移民浪潮。

第一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犹太世界联盟(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的成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巴勒斯坦地区,从阿拉伯富有者手中购买土地的行动开始了。1868年,犹太世界联盟派代表查尔斯·内特到巴勒斯坦调查移民开发农业的可能性,并随后批准了内特的开发计划,从1870年到1872年,先后购买了6400英亩土地,建立了第一所农校——米克维·以色列农校。这是犹太人通过购买土地,获得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的第一次尝试。正如该次行动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叶林在其回忆录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长久的百年大计”;“通过这次买地,我们希望能在若干年内,在约旦河畔垦垦出成千上万英亩荒地。如果我们能将它们变成可耕地,这片荒芜之地就将合法地免费归属我们了。”^{[1](P11)}从此,购买田地,建立犹太移民点,便成为一项持续性的世纪工程。1878年,回归圣地的第一次犹太移民潮开始了。由热爱圣山运动所组织的从俄国和罗马尼亚移居而来的几千名犹太人,出于建立自己的家园和国家的崇高理想,不顾当时土耳其政府的禁止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法令(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处于土耳其的控制之下),来到了巴勒斯坦,开始了建立自己家园的伟大事业。同时,有远见的当地犹太人,也加入到购买土地的行列中来,并建立了第一批犹太移民农业开发村(莫沙瓦)。随后,罗马尼亚的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开拓协会、俄国比卢运动、法国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男爵和波兰的移民机构,先后购买了土地,建立了三个莫沙瓦:佩塔蒂克瓦、里顺·锡安和罗什宾纳,并组织了上述国家的犹太人返回家园。但是,由于移民村的经济和生活极其困难,俄国将犹太人驱逐出莫斯科,迫使3万当地犹太人移民美国,以及俄国政府承认了热爱圣山运动的合法性,第一次犹太移民潮到1903年随即结束。

第二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1903年到1914年,主要发生在俄国和东欧国家。如果说,1882年刚开始的第一次犹太移民潮,还只是回归圣地的序幕的话,那么,到1903年,已经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后,有两件事情促使俄国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民,开始了第二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一是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并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在犹太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种犹太政党和团体纷纷成立,并开展活动。二是1903年在俄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在基什涅夫城几十名犹太人被反犹分子杀害,在霍麦尔城也有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只是由于犹太人的自卫组织的自卫行动,而未能得逞。于是,1903年12月5日,霍麦尔城的自卫者们,因无法在俄国继续滞留下去而作为第二次移民潮的第一批移民,到达了巴勒斯坦海岸,随后追随者络绎不绝。在这期间,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巴勒斯坦办事处(Jewish National Fund)有计划地购买土地和实现农业的移民开发,并成立了三个下属机构:犹太民族基金会、橄榄树基金会和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在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了大量土地用于安置犹太移民。就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受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建立公社(基布兹Kibbutz)、合作农庄(莫沙夫Moshav)和集体农场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形式。能够在合作农庄和集体农场工作,成为许多犹太移民的强烈愿望。获得这样的工作机会,被看作是一种荣耀和自豪。正如第一批在农场工作的女工萨拉·马尔金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谈起这件事,都觉得非常神圣。许多人还觉得不配去干它,认为自己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指导之后才有资格。但是,现在一切难题都解决了。”^{[1](P110)}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第二次回归圣地的移民潮。

第三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1919年到1923年,主要发生在俄国和波兰。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第二次回归圣地犹太移民潮的继续。这一移民潮发生的背景是,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反犹的法令被限制和取消,犹太人享有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于是,原来进行秘密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各党派便公开组党。其中锡安山青年党、犹太复国主义先锋青年运动世界联合会(简称Hehalutz)最引人注目。该联合会在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德国都设有支部。该组织通过其网络,成功地组织大量的欧洲各国的犹太青年移居巴勒斯坦。在这次移民潮中,其主体是单身的青年人,他们很多来自于同一城市或乡村,从小接受了回归

锡安山的教育,怀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为自己的复国主义理想和先锋精神所驱动,这为移民潮增添了活力。在短短的3年内,新移民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经济的主要劳动力。据统计,从1919年到1923年,有3.5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19年有大约2000人进入,以后几年平均每年有8000人左右迁入。到1924年,巴勒斯坦共有71个农业移民村,其中有20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建的。这在以往的移民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移民速度。在这5年中,犹太人口从5.6万人上升到9万多人。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的结构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的社团,在巴勒斯坦由多数成为少数。在这一时期,犹太工人联合总会(简称犹太工总)由于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建立的劳动兵团与青年卫士运动所建立的公社,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渴望着回归大地,拓荒开发,盼望着建立独立自主的农业移民村,以此为基础来建设国家。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劳动兵团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视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极少强调个人需要;而青年卫士运动则把每个个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作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到1923年夏天,由于巴勒斯坦就业形势恶化,失业率达到就业人口的12%-13%,第三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随即结束。

第四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又称为“格拉布斯基移民潮”,从1924年到1926年,移民的主体是波兰犹太移民。这次移民潮的迅速形成,是由如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波兰的财政部长格拉布斯基,针对波兰的犹太移民制定了收取重税的政策,沉重打击了犹太中产阶级,迫使大量的中产阶级的犹太移民迁出波兰;二是美国开始实施新移民法,限制了犹太移民移居美国的数量。美国历来是东欧国家犹太移民的主要目标国家,1921年有11.9万人进入美国,1924年仅为4万人,1925年跌至1万人。这自然加剧了犹太移民流向圣地的速度。与前3年每年平均进入巴勒斯坦8000名犹太人相比,1924年入境1.2万人,1925年高达3.5万人。虽然到了1926年降到1.4万人,但1924年到1926年短短的3年时间里,移民总数是6.1万人,而第三次移民潮总共才有3.5万人。第四次移民潮不仅仅在人数上大量增加,而且在社会构成上也有重大变化。表现在:前些年大多数移民是青年人,通常是单身汉,而且一文不名。而第四次移民潮中的人员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成分。他们是工匠、店主和小商人,也有一些掌握着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由于第四次移民潮中的成员,在波兰时大多数是居住在城市,因此,第四次移民潮中的80%人员都落脚在巴勒斯坦的城市里,继续从事在国外时的老职业,特别是在特拉维夫。1923年12月,特拉维夫是1.6万人,到1925年12月,达到了4万人,这还不包括在雅法的8000犹太人,圣城耶路撒冷和海法的犹太人口也迅速增加。这批移民的到来,刺激了巴勒斯坦地区商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也为回归的移民和以前的移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只有少量的移民去从事农业开发。在这期间,全国最大的销售组织——特努瓦成立,并在农业移民开发事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银行的成立和运转,对于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今日,它依然是以色列国家最大的银行之一。但是,好景不长,到1925年12月,经济形势趋于恶化,许多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移民人数随之大减。第四次欧洲犹太移民潮随之结束。

第五次回归圣地的犹太移民潮。从1929年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巴勒斯坦处于英国托管时期。而英国和阿拉伯人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于是,1929年在巴勒斯坦地区掀起了一场反对犹太人的浪潮。总共有133名犹太人被杀,约330人受伤。但这一事件,似乎对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潮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使得居住在欧洲国家的犹太人更加相信,在居住国没有发展的前途。重返家园——巴勒斯坦地区便汇成一股强大的移民潮流。1929年,有5200人,1930年有5000人,1931年有4100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咄咄逼人的反犹主义浪潮席卷全德国,随后遍及整个德国占领区。逃离德国和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犹太人优先考虑的迫切问题。由于这些原因,移民人数空前增加。1932年迁入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人是9500人,1933年3万人,1934年是4.2万人,1935年达到创纪录的6.2万人,由于政府的限制,1936年的移民人数跌到3万人。其后几年,移民人数逐年下降。^{[4](P246)}

从1929年到1936年,总共有18.8万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犹太人口从15.5万人上升到38.4万人。1931年的统计表明:犹太人有17.5万人,占总人口的17%;到1936年已占31%。在这5年的时间里,犹太社团的地位彻底改观。虽然犹太人在人数上还是少数,但是,从欧洲各国特别是从德国迁移而来的移民中,有大量的商人和各类专业人员: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还有许多专家,他们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富有经验,因此,在相对比重上,在教育水平、技能、组织能力等方面,已经与阿拉伯人分庭

抗礼。另外,以购置土地为目标的农业移民开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1929年到1936年,总共建立了65个移民村。1936年到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建立了53个新移民村。在新移民村中有37个是公社。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5.3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欧洲的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国家开拓和建设的先驱者,是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基石。正是由于欧洲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前赴后继,才使犹太人拥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自己的祖国,也才奠定了以色列国家的物质基础和法律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潮,就没有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欧洲的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先驱和功臣。

二、以色列建国后的移民进程与移民社会问题

经过欧洲犹太移民的艰苦奋战和苦心经营,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在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家,犹太国占地区总面积的62%。就在当时当地,英国政府宣布,将于1948年5月15日,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从而结束了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时期。1948年5月14日,英国的委任统治正式结束,就在这一天下午,欧洲的犹太移民先锋,出任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戴维·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的展览馆里,宣读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宣告以色列国家的建立。11分钟以后,美国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5月17日,苏联政府也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从此,犹太人迎来了以色列国家的新生。

1. 以色列建国后的移民进程

以色列建国以后,为全世界犹太人无限制地移居巴勒斯坦打开了方便之门。建国后的移民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8年到1972年,先后有14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移居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以色列首先接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欧洲犹太人,直接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集中营和塞浦路斯收留营来的犹太人达到10万人,其余来自波兰10万人、罗马尼亚10万人、保加利亚3.7万人和东欧其他国家,总共约35万人;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议会(Keneset)通过了《回乡法》(law of return)。按照此法律规定,所有的犹太人,无论其出生地如何,一概赋予在以色列定居的权利。^{[4](P565)}于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大批的东欧犹太人移居以色列;60年代的前5年,受以色列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吸引,居住在东欧国家、南非和美国的犹太人,大批移居以色列,移民总数达到21.5万人。^{[2](P110-111)}“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以这样高的比例来接纳各国的移民无疑是一种千钧重负。然而,这不只是为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而是代表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利益,肩负着为那些受迫害者的牺牲品提供一个避难所的重任。”^{[5](P566)}同时,这些移民对以色列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自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成为主流。在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1973年“欧安会”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苏联政府开始放松对犹太人离境的限制。于是,大量的苏联犹太人开始了移居以色列的漫长之旅。到1975年,大约有11.2万人离开了苏联,其中有10万人迁入以色列。1989年苏联局势动荡,在苏联居住的犹太人,再一次成为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牺牲品,此后,又有大批苏联犹太人离开苏联,移居以色列。到1991年12月,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到了328187人。如果将建国后所有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加以统计的话,总计501644人,位居移民国家的榜首。另外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流,来自于埃塞俄比亚。1984年以色列发动了“摩西行动”;1991年,又发动了“所罗门行动”;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29000名犹太人全部空运回以色列。至此,以色列历史上,来自于他国的大批犹太移民潮宣告结束。

2. 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国家。就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尽管以色列的主体民族是犹太民族,但是,大多是从世界各地移居而来,即使犹太人在以色列也具有明显不同的如下种类:“主要来自欧美的阿兹肯那齐犹太人,来自西亚、北非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肤犹太人,来自也门的也门犹太人,来自前苏联的俄国犹太人等等”;^{[6](P326)}就以以色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在以色列1992年人口统计的509万人中,犹太人是418万人,占总人口的82%,非犹太人少数民族是91万人,占

总人口的 18%。“在 91 万少数民族中: 穆斯林阿拉伯人 73.5 万人, 其中阿拉伯人约 67 万人, 贝都因人 6.5 万; 基督徒阿拉伯人 10 万人; 德鲁兹人 7.2 万人; 切尔克斯人 0.3 万人。”^{[2](P113)}显然, 以色列国比其他任何一个移民和多民族国家, 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着更严峻的社会整合和社会一体化的艰巨任务。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 西方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的融合和一体化问题。就以色列社会的民族或种族来说, 可以分为两类: 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犹太人中, 又大体可以分为西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两大类。西方犹太人是来自欧洲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他们长期生活在政治制度较为文明、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西方国家; 东方犹太人是指从巴比伦时代起一直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他们大多生活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因此, 在东西方犹太人之间, 在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家庭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西方犹太人是以色列最早的定居者和开拓先锋,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 建立了以色列国。他们是国家的缔造者, 是这块土地上文化模式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比较丰富的行政管理技能。他们有着西方的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们控制了国家权力机构和社会上‘受人尊敬’的职务。西方犹太人在以色列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 占有统治地位, 具有强大的势力。”^{[2](P113)}与西方犹太人相比, “东方犹太人有属于东方的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素质一般低于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对主要是西方犹太人中的思潮——锡安主义不熟悉、不热忱, 对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理解、不支持, 对按西方政治模式建立的以色列国不习惯、不适应。他们仍忠于自己家族的社团……总之, 东方犹太人在某些方面是以色列国一个格格不入的居民群体”。以色列建国以后, 东方犹太人迫于原居住国的政治压力, 两手空空回到祖国, 处于无权受惠的地位。因此, 往往被安置在经济上并不发达的开发城镇或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 由于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逐步改善, 仍然使老一代东方犹太人对西方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的拯救充满感激之情。随着以色列经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高速增长, 青年一代的东方犹太人, 冲破了老一代东方犹太人的感恩思想, 不满意西方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和垄断地位, 要求在政治上有同等的机会、经济上自由竞争等。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由于东方犹太人的出生率高, 4 个子女以上的家庭在东方犹太人中占 50% 以上, 而西方犹太人的家庭只占 4%。因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东方犹太人的总数首次超过了西方犹太人。于是, 东方犹太人的社会要求就空前高涨起来。在经济上他们要求自由竞争; 在政治上他们要求改变西方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 同时倒向宗教和民族主义。这就为 1977 年右翼集团——利库德集团的上台奠定了基础。^{[2](P112—113)}尽管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促进东西方犹太人的融合和一体化, 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犹太人的平等, 任重而道远。

第二, 犹太人与其他民族, 特别是阿拉伯人的融合和一体化问题。早在以色列建国时, 开国元勋们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念。本-古利安在建国初就提出: “我们必须把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熔化掉, 在复兴民族精神这个模子里, 重新加以铸造。”^{[6](P65)}在《独立宣言》中他也同样指出: “我们仍号召以色列国的阿拉伯居民在有充分和平等的公民权和在各种临时的及永久的团体和组织中有相当的代表权的基础上, 维护和平并且在国家的发展中贡献出他们的力量。”按照宣言的这一规定,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有平等的代表权, 有权当选为议员, 有权在国家机构任职, 有权进入以色列总工会等等。^{[2](P113)}但是,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以色列中的阿拉伯人处于以色列的社会低层, 甚至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由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所具有的双重身份, 阿拉伯人往往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 是以色列的公民, 另一方面, 又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一分子。在他们身上, 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有时产生激烈的冲突。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敌视和仇恨由来已久, 不可能不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阿拉伯国家把他们看作是敌对国家——以色列的公民, 因此, 敌视或歧视他们; 而在开放的以色列社会,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实际上是两个互相封闭的群体, 犹太人作为以色列的多数民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并不能平等地对待阿拉伯人, 对他们进行限制、歧视, 剥夺他们的某些权利。特别是 1967 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 并采取高压政策以后, 进一步增强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族情感。正因为如此, 以色列政府并不能做到平等地对待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正因为如此, 1992 年 7 月 13 日, 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就职演说中承认: “我们错待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德鲁兹人……在许多方面, 犹太群体和阿拉伯群体有天壤之别……政府将

尽一切努力缩小这种差距。^{[2](P113)}但随着拉宾遇刺,以色列政府在上述方面,并没有大的社会改革举措。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由于在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不同的原因,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总起来说,处于社会的低层。据统计,阿拉伯人的家庭收入一般只有犹太人家庭收入的83%,与西方犹太人家庭相比,收入更低。但由于阿拉伯人的家庭成员多,每位阿拉伯妇女平均有子女5.7人,而每位犹太妇女仅为2.7人。因此,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犹太人。由于经济方面的差距,阿拉伯人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于是,在社会职业的选择上,阿拉伯人多数从事雇工或建筑工人,从事服务性行业和担任高级行政管理的人数极少。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从而使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社会最低层的贫困群体。

尽管以色列政府在消除国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不平等关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如果在国际环境方面,以色列国家与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不能从根本上改善,那么,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关系,也不会有实质上的改观。

回顾欧洲犹太移民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以色列的移民问题,我们为欧洲的犹太移民展示出来的那种发奋努力、不屈不挠的先锋精神所感动。他们是以色列国家奠基的功臣,是以色列国的开拓者和最早的建设者;同时,我们对多灾多难又充满无穷智慧的犹太民族充满了敬仰。这种敬仰之情,正如塞西尔·罗斯所说的那样:“这里有这样一个民族,在一代人之间变成了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恢复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恢复了自己的语言,恢复了过去的统一,从那些小商贩和小店主的旧货物堆和大杂院里获得了新生,一代年轻的英勇战士成长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一群学子。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从最深重的灾难废墟上站立了起来,在最危机的关头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离她实在太近了,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仍然远远无法估价这一成就的辉煌程度和这次再生的非凡所在。”^{[5](P580)}我们在研究以色列的先驱——欧洲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功勋时,同样也应当注意到,以移民为基础建立和发展的以色列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移民社会问题。以色列要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移民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 [1] Chaim Gvati: A Hundreded years of Settlements [M]. Hakkibutz Hameuchad Publishing House Ltd. 1981.
- [2] 徐向群. 第三圣殿: 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 [3] Klaus J. Bade. Europa in Bewegung. Muenchen: Bade Bade Presse, 2001.
- [4] 哈伊英亩·格瓦蒂. 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5] 塞西尔·罗斯. 简明犹太民族史[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6] 潘光, 陈潮南, 余建华. 犹太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The Wave of Jewish Emigration in Europe and the Problem of Immigration in Israel State

SONG Quan-cheng

(Institute of Europe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Abstract Israel is the only state of emigrants in strict sense.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the Jewish in European countries experienced five waves of immigration into Israel and established the legitimacy of Israel State. The further emigra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State facilita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while giving birth to some increasing problems of immigration.

Key words: Jewish emigrants in Europe; Israel State; Problem of Immigration

[责任编辑 刘京希]